

文章编号:1002-980X(2007)07-0090-06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樊海潮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对 H. Davoodi, D. Xie, and H. Zou 的两篇文章中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了改进;把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看作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并利用 1986 - 2004 年间的对数据对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两组回归分析。发现在 1986 - 1990 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的比重过高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在 1991 - 2004 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与我国的最大化经济增长相符。最后,对得出的统计结论进行了充分的解释。

关键词:财政分权;经济增长;财政决算支出;政府花费

中图分类号: F224.0 **文献标志码:** A

1 引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接近 10% 的破纪录速度增长。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因素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实现对外开放,建立特别行政区,技术引进,各种价格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业改革,在企业管理中引进物质激励的企业改革等等。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是否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呢?

许多理论文献认为财政分权的加大有利于改进公共部门的有效性,减少财政赤字,和加快经济增长。财政分权可以增加经济的有效性是因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比能够更好得提供各种公共物品的服务以满足本地的需要^[1]。当然,存在一些有关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的统计型文章。它们有的支持,有的反对财政分权的加大有利于经济增长。反对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有:Zhang and Zou 利用 1980 - 1992 年间的对数据对中国的财政分权对其经济增长做了统计分析,并得出财政分权不利于省的经济增长^[2];H. Davoodi, and H. Zou 运用了 46 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 1970 - 1989 年间的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有负的相关性,对发达国家来讲它们之间不存在相关性^[3];H. Davoodi, D. Xie, and H. Zou 用 1948 - 1994 年间的对数据对美国进行了分析得出进一步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不利^[4]。支持财政

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文章有:Nobuo Akai and Masayo Sakata 对美国分州作统计分析得出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5];Atsushi Iimi 同样利用和 H. Davoodi, and H. Zou 相同的 46 个国家的数据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性^[6];林毅夫,刘志强通过利用中国 1985 - 1993 年间的对数据统计分析,认为财政分权加速了省的经济增长^[7]。当然还有好多别的关于经济增长的文章,上面统计文章得出结果的不同是因为考虑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不同和所用的表示财政分权的变量不同所导致的。

本文将利用 1986 - 2004 年间的对数据从全国范围内来研究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首先,我们将介绍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接着,利用 1986 - 2004 年间的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得出结论。

2 理论模型

我们的模型考虑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一个消费者。采用 Arrow^[8]和 Barro^[9]所用的效用函数,把政府的公共花费和私人消费引进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我们记中央政府公共花费为 f , 地方政府为 h , 私人消费为 c 。我们把 g 定义为总的政府花费有: $f + h = g$ 。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c, f, h)$ 。假设和私人消费一样,消费者从中央政府花费和地方政府花费中获得正的,递增的边际效用。即 $u_c > 0, u_f > 0, u_h > 0, u_{cc} < 0, u_{ff} < 0, u_{hh} < 0$

收稿日期:2007-02-09

作者简介:樊海潮(1982—),男,安徽砀山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数理经济。

为了得到我们的分析结果,我们把效用函数取为:

$$u(c, f, s, h) = \frac{c^{1-\theta} - 1}{1-\theta} + \frac{f^{1-\theta} - 1}{1-\theta} + \frac{h^{1-\theta} - 1}{1-\theta}$$

其中 θ 的倒数是跨时叠代弹性。这样消费者的贴现效用和为:

$$\int_0^{\infty} u(c, f, h, s) e^{-\beta t} dt \quad \text{其中 } 0 < \beta < 1 \text{ 为贴现率。}$$

推广 Arrow - Kurz - Barro 的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假设产出有下面的生产函数给出 $y = y(k, f, h, A, \psi)$ 其中表示 y 人均产出量, k 为私人的资本存量, A 为技术水平, ψ 为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

本文采用 CES 形式的生产函数:

$$y = A[\alpha k^\phi + \beta f^\phi + \omega h^\phi]^{1/\phi} \psi^{1-1/\phi} \quad (1)$$

其中 $0 < \alpha, \beta, \omega < 1, \phi > 0$ 为常数,满足 $\alpha + \beta + \omega = 1$

总的政府花费 g 全部来自政府的税收,假设税收率为 τ ,则: $g = \tau y$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之下,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可以表述为:

$$\begin{aligned} \frac{dk}{dt} &= (1 - \tau) y(k, f, h, A, \psi) - c - (\delta + n) k \\ &= (1 - \tau) A[\alpha k^\phi + \beta f^\phi + \omega h^\phi]^{1/\phi} \psi^{1-1/\phi} - c - (\delta + n) k \end{aligned}$$

其中 δ 为资本的折旧率, n 表示人口增长率。

在政府行为给定下,消费者在自己的预算约束下,选择他的消费路径和资本积累路径来极大化他的贴现效用。即:

$$\max: \int_0^{\infty} u(c, f, h, s) e^{-\beta t} dt$$

满足预算约束条件 $\frac{dk}{dt} = (1 - \tau) y(k, f, h, A, \psi)$

$$G = \frac{\alpha(1 - \tau) A[\alpha + (\beta\varphi_f^\phi + \omega\varphi_h^\phi) (\tau y/k)^\phi]^{(1-\phi)/\phi} \psi^{(1-1/\phi)} - \beta - \delta - n - g}{\theta} \quad (8)$$

由(1)式即: $y = A[\alpha k^\phi + \beta f^\phi + \omega h^\phi]^{1/\phi} \psi^{1-1/\phi}$ 可知,

$$\begin{aligned} y &= A[\alpha k^\phi + \beta f^\phi + \omega h^\phi]^{1/\phi} \psi^{1-1/\phi} \Rightarrow \\ (k/\tau y)^\phi &= \frac{1/A \psi^{1-1/\phi} - (\beta(\varphi_f)^\phi + \omega(\varphi_h)^\phi)}{\alpha^\phi} \end{aligned} \quad (9)$$

$$G = \frac{\alpha(1 - \tau) A \left[\frac{\alpha A^{-\phi} \psi^{1-\phi} \tau^{-\phi}}{A^{-\phi} \psi^{1-\phi} \tau^{-\phi} - (\beta\varphi_f^\phi + \omega\varphi_h^\phi)} \right]^{(1-\phi)/\phi} \psi^{(1-1/\phi)} - \beta - \delta - n - g}{\theta} \quad (10)$$

从上式我们可知,人均产出增长率与税收、财政分权的程度有关,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通货膨胀率有关。

$$- c - (\delta + n + g) k; \quad (2)$$

资本存量 $k(0) = k_0$ 给定。

下面求解消费者的问题。定义 Hamilton 函数

$H = u(c, f, h) + \lambda[(1 - \tau)y - c - (\delta + n + g)k]$ 。其中 λ 为 Hamilton 乘子,表示财富的边际效用。这样,得到最优性条件

$$u_c(c, f, h) = c^{-\theta} = \lambda \quad (3)$$

$$\begin{aligned} \frac{d\lambda}{dt} &= \beta\lambda - \lambda\alpha(1 - \tau)A[\alpha k^\phi + \beta f^\phi + \omega h^\phi]^{1-\phi/\phi} k^{\phi-1} \psi^{(1-1/\phi)} \\ &\quad + (\delta + n + g)\lambda \end{aligned} \quad (4)$$

和横截性条件: $\lim_{t \rightarrow \infty} \lambda k e^{-\beta t} = 0$

公式(2), (3), (4) 和横截性条件以及初始条件决定了代表性消费者的最优的消费路径。从上面两式可得:

$$\frac{dc/dt}{c} = \frac{r(x) - \beta - \delta - n - g}{\theta} \quad (5)$$

其中 x 代表 k, f, h, τ, A, ψ 的函数,

$$r(x) = \alpha(1 - \tau)A[\alpha k^\phi + \beta f^\phi + \omega h^\phi]^{(1-\phi)/\phi} k^{\phi-1} \psi^{(1-1/\phi)} \quad (6)$$

我们定义中央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花费的所占总花费比例分别为:

$$\psi_f = \frac{f}{g}, \psi_h = \frac{h}{g} \quad (7)$$

把(6), (7)代入(5)我们可以获得在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时,私人的消费水平的增长率。在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时,私人的消费水平的增长率与私人资本增长率、人均产出增长率、总政府的花费增长率以及地方政府花费增长率相等。因此,在平衡增长路径时,人均产出的长期增长率为:

把(9)式代入(8)式,我们可得:

$$\text{性质 2: 当财政分权的程度为 } 1/\left(\frac{\beta}{\omega}\right)^{\frac{1}{1-\phi}} + 1$$

$[0, 1]$ 时, 人均产出增长率达到最高; 当 $\varphi_h >$

$1/\left(\frac{\beta}{\omega}\right)^{\frac{1}{1-\phi}} + 1$, 人均产出增长率对财政分权的程度负相关; $\varphi_h < 1/\left(\frac{\beta}{\omega}\right)^{\frac{1}{1-\phi}} + 1$ 人均产出增长率对财政

分权的程度正相关。

证明: 人均产出增长率对财政分权求导可得:

$$\frac{dG}{d\varphi_h} = -m(\omega\varphi_h^{\phi-1} - \beta\phi(1-\varphi_h)^{\phi-1}), \text{ 其中}$$

$$m = \frac{\alpha^2 A^{1-\phi} \psi^{1-\phi} \tau^{\phi(1-1/\phi)} (1-\tau)(\phi-1) \left[\frac{\alpha A^{-\phi} \psi^{1-\phi} \tau^{-\phi}}{A^{-\phi} \psi^{1-\phi} \tau^{-\phi} - (\beta(1-\varphi_h)^{\phi} + \omega\varphi_h^{\phi})} \right]^{(1-2\phi)/\phi}}{\theta \psi (A^{-\phi} \psi^{1-\phi} \tau^{-\phi} - (\beta(1-\varphi_h)^{\phi} + \omega\varphi_h^{\phi}))^2}$$

明显 m 大于零, 从而人均产出增长率对财政分权的程度的关系与 $\omega\varphi_h^{\phi-1} - \beta\phi(1-\varphi_h)^{\phi-1}$ 有关。明显, $\varphi_h = 1/\left(\frac{\beta}{\omega}\right)^{\frac{1}{1-\phi}} + 1$ $[0, 1]$ 时, 财政分权程度刚好使得人均产出达到最大增长速度。

3 实证分析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将财政控制下放给地方政府, 或者说, 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我国的财政分权应该开始于 1985 年。

首先也是非常重要是如何衡量我国的财政分权的程度, 即用什么指标来表示我国的财政分权的程度。一般来说, 捕捉财政分权特征的指标有许多, 比如地方政府的审批预算权、举债权、征税权、地方政府就业人数占公共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公民参与和影响本辖区财政决策的程度等。不过, 通常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自主权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这两个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在中国财政分权的实证研究中: Ma 的方法是以省级政府在预算收入中的保留的平均份额来代表财政分权度^[10]; Zhang 和 Zou 通过人均的省预算开支和人均的中央预算开支的比率, 人均的省决算开支和人均的中央决算开支的比率或者按照人均收入得出的省预算外开支和中央预算外开支的比率来衡量财政分权^[2]; 林毅夫和刘国强通过省级政府在本省预算收入中的边际分成率这一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当然财政分权是一个较难衡量的问题, 每种衡量方法都存在着各自的问题。上面的几篇文章都是在分省的情况下, 来研究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下面, 我们主要通过对 1986 年到 2004 年的数据和 1991 年到 2004 年的数据分别进行一般线性回归, 来研究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把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看作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 (例如 Ocates^[11] 和 Davoodi, Xie, and Zou^[4])。我们这样做有两点好

处: 由于我们只考虑 1986 年以后的数据就避免了关于是否 1985 以前中国存在财政分权的分歧; 考虑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帮助我们避免了关于省的开支与各省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有关的问题。

我们通过 1986 年到 2004 年的数据来分析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如图 1。我们可以看出 1990 年, 1994 年和从 1996 年到 2000 年财政支出的比重有所下降, 在别的年份中是增加的, 特别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现在基本在 70% 左右徘徊。因而, 我们还将用 1991 年到 2004 年的数据来分析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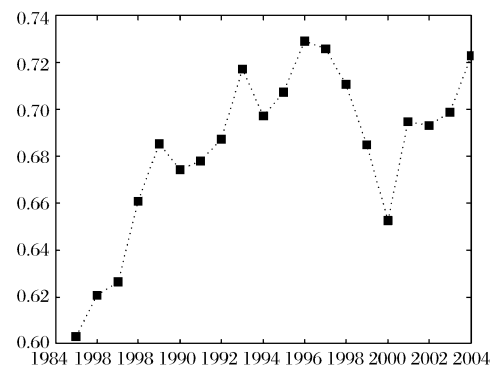


图 1 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

$$\dot{y}_t = x_t \delta + \mu_t \quad (11)$$

其中 $\dot{y}_t$ 表示人均产出增长率。我们通过 $(y_t - y_{t-1})/y_{t-1}$ 来衡量。 x_t 表示与经济增长有关的一些主要因素, 其中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 (被用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 δ 则表示待估计的参数所组成的向量, μ_t 是残差项。

下面我们说明 (11) 式中所用到的变量以及它们是怎么算出的。(11) 式中的 x_t 包括几项: 常数项, 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 劳动力增长率, 人均投资水平的变化, 人民受教育程度的变

注: 林毅夫和刘志强等著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对中国财政改革的经过给予了充分的论述。从中可以得出我国财政分权始于 1985 年。

化,通货膨胀率,以及关税水平。我们知道技术进步很大一方面体现在劳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程度上,或者说体现在劳动力的质量或人力资本存量上。因而,可以用高中毕业生人数的变化来表示技术的进步。对于平均税收我们通过国家财政决算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衡量。对于通货膨胀率我们用一揽子价格变化也就是居民的消费价格变化来衡量。国内市场的开放性程度可以通过平均关税(定

义为总体关税占总体进口的比例)来表示。越高的平均关税表明越低的开放程度。其中,总体关税用国家财政决算收入中的关税来代替。对于(11)式中的劳动力增长率和人均投资水平,我们用在岗职工人数的变化来表示劳动力的变化;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产率来衡量人均投资水平的变化。

我们用一般最小方差线性回归对(11)式进行估计。结果如下表:

表 1 1986 - 2004 年间的回归分析表

从 1986 年到 2004 年	OLS(2)	OLS(3)	OLS(4)	OLS(5)	OLS(6)
常数项	0.246 5 (2.11)	0.244 433 (2.03)	0.371 9 (3.09)	0.372 0 (3.24)	0.410 0 (3.10)
平均税收	- 0.336 1 (- 2.07)	- 0.354 4 (- 2.05)	- 0.683 6 (- 3.22)	- 0.684 1 (- 3.37)	- 0.592 (- 2.34)
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 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	- 0.214 2 (- 1.45)	- 0.263 7 (- 1.34)	- 0.328 4 (- 2.26)	- 0.337 3 (- 2.42)	- 0.397 7 (- 2.32)
人均投资水平的变化	0.156 5 (7.65)	0.153 7 (6.96)	0.141 9 (7.07)	0.134 1 (6.74)	0.132 3 (6.41)
劳动力增长率		0.034 1 (0.42)	0.178 6 (1.85)	0.158 4 (1.70)	0.150 7 (1.56)
受教育程度的变化			0.112 4 (2.21)	0.152 8 (2.73)	0.134 7 (2.11)
通货膨胀率				0.072 9 (1.47)	0.081 7 (1.55)
平均关税					- 0.189 2 (- 0.64)
Adjusted R - squared	0.782 275	0.768 706	0.822 093	0.837 797	0.828 633
Number of observation	19	19	19	19	19
F - statistic	21.360 00	15.124 89	16.711 16	15.634 49	12.743 15

注:表中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它们有的是直接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有的是对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出来的。

上表是我们利用 1986 年到 2004 年的数据对(11)进行的回归计算得出的结果。我们从此表可以看出财政分权的系数都是负的;这表明了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的不是正面,而是反面作用,也就是说越高的财政分权将伴随着越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前面的理论模型告诉我们:负,且显著的系数表明财政分权过高或者说财政分权地方的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过高;正,且显著的系数则表明财政分权过低。在上表中,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的系数全部都是负的,并且其中有三项是显著的。这表明我国的财政分权过高,也可以说地方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过大。

经验理论告诉我们高速的经济增长一般伴随着低的税收,低的关税和高的劳动力,高的投资水平以

及高的公民受教育程度。通过对上表观察可以看出我们得出的结果和经验理论是完全相符的,因为平均税收和平均关税的系数是负的以及劳动力增长率,受教育程度的变化和人均投资水平的变化的系数是正的。我们知道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发展是不好判断的;我们得出的结果是不显著的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利用 1991 年到 2004 年的数据对(11)进行的回归计算得出表 2,如下:

虽然表 2 中的 OLS(5)列的受教育程度的变化的系数是负的(似乎与经验理论不相符),但是它是非常不显著的,因而并没有违背经验理论。别的项的系数都能很好和经验理论吻合(这一点可以从表 1 的介绍中看出)。值得我们关注的应该是地方财

表 2 1991 - 2004 年间的回归分析表

从 1991 年到 2004 年	OLS(1)	OLS(2)	OLS(3)	OLS(4)	OLS(5)
常数项	0.129 0 (1.34)	0.134 2 (1.53)	0.161 6 (1.43)	0.166 4 (1.49)	0.331 5 (2.23)
平均税收	- 0.286 7 (- 2.29)	- 0.306 1 (- 2.69)	- 0.380 6 (- 1.78)	- 0.300 6 (- 1.35)	- 0.326 0 (- 1.59)
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 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	- 0.045 0 (- 0.35)	- 0.042 2 (- 0.36)	- 0.069 5 (- 0.50)	- 0.095 5 (- 0.68)	- 0.279 2 (- 1.59)
人均投资水平的变化	0.125 6 (7.28)	0.112 7 (6.53)	0.114 5 (6.14)	0.103 0 (4.88)	0.137 8 (4.60)
劳动力增长率		0.098 2 (1.77)	0.117 7 (1.58)	0.098 9 (1.31)	0.115 9 (1.66)
受教育程度的变化			0.021 8 (0.42)	0.042 3 (0.78)	- 0.033 8 (- 0.48)
通货膨胀率				0.065 5 (1.11)	- 0.045 4 (- 0.50)
平均关税					- 0.844 4 (- 1.53)
Adjusted R - squared	0.806 160	0.840 405	0.824 317	0.829 332	0.856 522
Number of observation	14	14	14	14	14
F - statistic	19.021 91	18.114 02	13.199 40	11.528 58	12.086 57

注：表中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它们有的是直接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有的是对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出来的。

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的系数。通过与表 1 中的系数作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表 2 中的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的系数在各列中都是相对较大的。而且表 2 中的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的系数都是不显著的，这与表 1 不同(表 1 中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的系数中五项有三项是显著的)。表 2 中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的系数虽然都是负的，但是都不显著，这表明我国 1990 年以后的财政分权的程度是与理论模型中的经济增长最大化一致的。从中可知 1990 年以后我国的财政分权的比重是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深化财政分权和减少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对我国经济增长都是有利的。

1986 年到 2004 年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的平均值是 0.6877，而 1991 年到 2004 年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的平均值是 0.700 0(是大于 0.687 7)。从上面两表我们可知用 1986 年到 2004 年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财政分权过高而用 1991 年到 2004 年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财政分权的比重是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深化财政分权和减少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对我国经济增长都是有利的。可

见 1986 - 1990 年我国财政分权过高而九十年代以后就没有这种情况了。值得一提的是为什么用 1986 年到 2004 年的数据而不用别的数据来做第一组回归分析以及我们怎么看出 1986 - 2004 年的财政分权过高呢？因为：1986 年以前我国还没有真正施行财政分权，从而必须用 1985 年以后的数据；1986 年到 1990 年的数据太少，从而无法作回归分析；用 1986 年到 2004 年的数据除了 1986 年到 1990 年的数据和我们第二组做 1991 - 2004 年的回归分析数据相同；从而它们得出不同的结果应该是因为 1986 - 1990 年的数据而造成的，因此我们把 1986 - 2004 年的数据和 1991 - 2004 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得出 1986 - 1990 年的情况(即在 1986 - 1990 年，我国财政分权过高且对我国经济增长有负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 1986 - 1990 年的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小于 1991 年到 2004 年的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但得出的结果反而是前者财政分权的比重过高而后者却正好。我认为出现这种结果是和我国的从改革开放以来所经历的变化相符合的。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我国当时的经济水平相对于别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是非常落后的。当时好多基础设

施——公路,铁路,电厂,通讯等等...都不发达,而基础设施不好影响经济的增长。并且只有中央政府才会首先考虑在全国内建立交通网,通讯网和电网,而各省最多考虑省内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良好的全国性的交通网、通讯网和电网等等,各省之间很难进行贸易往来,这样自然而然的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基本建好了各种全国性的公路、铁路网,通讯网和各种大中小型电厂,从而它们不再是经济增长的障碍。此时,由于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比,在资源配置上具有信息优势。从而地方政府可以更好得提供各种公共物品的服务以满足本地需要。而且,当地方政府的官员承担起提供公共物品服务的责任时,他们也就处于当地居民更严密的监督之下,从而也更有动力去行使他们的财政职能以为公众谋求最大利益。另外,中国的地方政府控制着大量的地方企业。财政分权可能硬化了地方企业的预算约束,从而可能提高了地方企业的效率,并导致了高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因而1990年以后虽然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相对与八十年代增加了,但是此时的比重并没有过高,反而与经济增长吻合。

4 结论

这篇文章首先对 H. Davoodi, D. Xie, and H. Zou^[4,14]的两篇文章中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了论述;然后利用1986-2004年间的对数据对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两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1986-1990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的比重过高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在1991-2004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与最大化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相符。在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1986-1990年我国的财政分权的比重过高阻碍了经济增长是因为当时我

国的基础设施还很差;而1990年以后我国虽然提高了财政分权的比重但是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与最大化经济增长相符是因为此时我国已经基本建好各种基础设施,和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具有信息优势,以及财政分权可能硬化了地方政府控制的大量地方企业的预算约束。

参考文献

- [1] W OATES. Fiscal Federalism[J].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 New York, 1972.
- [2] H ZOU, T ZHANG.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8 (67).
- [3] H DAVOODI, H ZOU.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 - Country Study"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8, 43:244 - 257.
- [4] H DAVOODI, D XIE, H ZOU.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9, 45:228 - 239.
- [5] NOBUO AKAI, MASA YO SAKATA.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State - Level Cross - Section Data For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2 (52).
- [6] ATSUSHI IIMI.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sited: an Empirical Note[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5(57).
- [7] 林毅夫, 刘志强, 等.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J]. 北京大学学报, 2000(4).
- [8] ARROW K, KURZ M. Public Investment, the Rate of Return and Optimal Fiscal Policy[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 [9] BARRO R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S103 - S125.
- [10] MA JU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in the 1990s[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 C. 1997.
- [11] W OATES. Searching for Leviathan: An empirical stud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748 - 787.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FAN Hai-chao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is essay improves the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 in H. Davoodi, D. Xie, and H. Zou (1998) and (1999). Moreover, it uses the weigh of the local fiscal allocations in consolidated spending as an index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analyzes the annual data from 1986 through 2004 to examine the link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s a result, we find that the spending shares for local government in 1986 - 1990 impede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hile the shares in 1991 - 2004 are consistent with maximizing economic growth. Finally, it explains why this phenomenon would happen.

Key word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consolidated spending; government spending